

目 录

- 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琐忆……………吕雄才
辛传德协助整理 (1)
- 二、“五四”时期罗定学生运动与《泅江学报》……
……………陈大远 (18)
- 三、罗定粤剧团简史……………李群高 (23)
- 四、罗定商会及罗定工商联筹委会历史概述……………
……………梁鼎芳 (35)
- 五、辛亥革命后罗城镇杂货业史略……………崔民 李景 (45)
- 六、抗日战争前后罗城镇五金陶瓷业概况……………
……………崔民 陈孔修 (61)
- 七、罗定解放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徐东 (70)
- 八、先秦时代罗定越族浅说……………陈英林 (79)

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琐忆

吕雄才 辛传德协助整理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以求索

——屈原

一九一九年在北平爆发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潮，迅速遍及全国，罗定，这个偏僻的小镇顿时风起云涌，投进了革命的洪流。当时还是个小学校低年级学生的我，倾听着宣传者在街头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参加罢课，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示威游行，到商店、大埠头的货船上搜查、没收日货，运送到义塚地焚烧……，广阔的社会大课堂给我上了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使我懂得了帝国主义野心灭亡我国、不抵抗便会当亡国奴的道理；有了国家民族的观念；培育了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

一九二六年秋，我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了中山大学矿物地质系预科，读了两年，升上本科。刚升上三年级，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九·一八”沈阳事变，蒋介石政府下令不许抵抗，转瞬之间东北全部沦陷。中山大学放了假，我和区继德、谭明昭、邱家骏、邱家驥、吴启钦、黄廷英、黄松（外县人）等一班同学回罗定。此行有两个任务：一、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我们日间在旧罗师中山纪念亭前的大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演讲时事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晚上演出文艺节目，负责编写和排练节目的是我和黄松。记得当

时的听众、观众以中学师生为多。二、为菁莪、德义两局中止付给省罗定学会经费的事办交涉。

翌年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又在上海制造事端，派出陆战队不时向我武装警察挑衅，蔡廷锴将军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坚决抗击。当时林一元是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区寿年师的后方主任，驻在广州，我在课余时间协助他搞些宣传和联系华侨捐款支援等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蒋介石政府又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积极谋求与敌妥协，五月间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并即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政府丧权辱国的消息频频传来，在此人心动荡的时刻，我仍能沉着气修完了大学的课程，一九三二年秋，我毕业了，求职无门，只得返乡在罗定中学做数学教师。

时局不宁，国事蜗蟪，科学救国的理想何时实现？怎能安下心来教书？一九三三年秋，我和林一元到福建去投奔我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爱国将领蔡廷锴、区寿年。

到福建后，我被派到闽西善后委员会永定县坎市办事处工作。办事处主任是杨伯凯。闽西的龙岩、连城、长汀和闽北的建宁等几个县都曾建立过红色政权，分过田，十九路军入闽后，这些地方尚有红军活动，农村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红军方面有关系的一些人走了，原已逃走的国民党方面有关系的一些人回来了；因此，有的田地无人耕种，有的人无田地耕种，引起了纠纷，影响生产。善后委员会在农村的工作重点是调解纠纷，调剂田地，缓和矛盾，安定局面。我在坎市办事处就是做这种工作。我下乡时借住在一位老大娘简姆的家里，她个子瘦瘦，精明能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对

待我这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她象慈母般和蔼可亲。记得我所接触的当地群众，对十九路军的观感是颇好的。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闽变前夕，我被调回七十八师搞政治宣传工作。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福州召开了群众大会，树起抗日反蒋大旗，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七十八师改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十九路军第三军，区寿年任军长，林一元任军政治部主任，我任科长。十九路军派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往苏区谈判，他回来后曾对我说，“苏区什么都有，连《东方杂志》（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份综合性文艺杂志）也有。封锁，封锁，什么也封锁不了！”

十二月下旬，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调遣嫡系部队十五个师的兵力入闽。先头部队刚进闽境，就出动飞机，不分城镇农村连续疯狂轰炸。我们天天“走飞机”，记得有一次行军途中经过一个圩场，突然敌机群扑到上空，我仓猝间躲到一棵树下，险些被炸死。

翌年一月间，蒋介石亲自入闽坐镇建瓯指挥，闽北大部分地区失陷。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叛变，逼迫区寿年、沈光汉（第一军军长）二人离开部队，遗下的部队官兵，要么接受改编，要么遣散回乡。我几经踌躇考虑，选择了回乡一途。

这年（一九三四年）二、三月间，蒋军派了四艘大船，两艘送人去南京接受改编，两艘送人到广州后各自回乡。我置身于蒋军派兵押送的船上，虽然不至于“阶下之囚”那样地没有丝毫的自由，但目睹全副武装的蒋军士兵来回巡视，难友们噤若寒蝉，默然相对，各怀心事，气氛沉闷得叫人难

以呼吸；闽变失败了，前途茫茫，今后何去何从？我心头苦
恼而焦灼。后来想到徐名鸿（十九路军秘书长，闽变后为龙
汀省副省长）曾与蔡廷锴约同取道汕头去香港的，就只盼快
到汕头登岸到丰顺县汤坑徐家去，情绪稍好。岂料船抵汕头
时，在江心停泊，当地驻军李扬敬部队不准人登陆，又听到
蒋介石要对原十九路军政工人员搞集训，进行甄别审查，更
觉不安。正在彷徨无计，有几只小艇摇到大船边叫卖粥品，
我灵机一动，就和几位谈得来的潮汕难友商量：与其“枯坐
待毙”，不如铤而走险，跟卖粥的人打交道逃走？于是躲过
卫兵耳目，冒着凛冽的江风，从邻船旁垂下江心的大缆绳攀
落小艇，与他们情商，竟然得到答允，把我们送到了码头
边。但上了码头，守门的军警却不准我们进入市区，不由分
说地把我们带到一所房屋里。屋里挤了上百人，都不准自由
出入，而这时的我已是又怕又累，饿得无法走动了。后来公
推了几个人去交涉，才送来了食物，是桶装的稀粥，还有少
许潮州芥菜头。这天晚上，我吃着生平第一次尝试的芥菜头
送粥，觉得味道很香，任何佳肴不能与之相比。天亮后解
禁，我即往徐家，徐的弟弟徐名东（曾与我同事）热情接待
我，他告诉我徐名鸿没有回来，也不知道情况如何（后来才
知道，二月间蔡，徐二人到达永定后分手，徐化装成伤病
员，不幸在大埔被广东部队黄任寰部逮捕，旋即被害）。在
徐家住了几天，还是得不到什么消息，就返回罗定，再在罗
定中学教书。至于回广州的那两艘船，听说其中一艘到广州
天字码头将靠岸时，广州军阀陈济棠的军警不准人们上岸，
双方争执不下，军警竟向船上开枪扫射，死伤了二、三十人

之多。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在芦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全国人心振奋：国家仇，民族恨，雪耻有望，现在是为国出力的时候啦！我自闽变失败后回到罗定，遭当局歧视为“闽变余孽”的满肚子闷气，也不知道丢到哪儿去了，只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天天有做不完的事。目睹罗定当局和接收壮丁的队伍囚禁、奴役、虐待壮丁（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征兵制的入伍的士兵）的恶劣行为，罗中师生义愤填膺，公推我为领队，到县政府请愿。我们慷慨陈辞，力斥其非：为什么要役使壮丁担盐？为什么他们上厕所时要用绳捆绑双手连成一串地去？岂不是比犯人不如？要知道他们是光荣地上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士，受到这样的虐待，怎能打仗？要知道“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抗日，否则就亡国”……，并要求他们第二天烧爆竹欢送壮丁，我们罗中师生也列队欢送。随后，罗中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我被选为队长，带领罗中师生到县城街头、中山纪念亭前的操场上宣传演出，逢圩期，我们又穿着草鞋、戴着大眼帽，举着队旗，背着道具，到罗镜、船步、蒗塘等圩镇、田头演剧，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课余时间，我与焦寿卿老师合作出版油印《扫敌报》。有一天，罗定县长曾越和一些士绅请我到县政府“吃饭”，席间，他们转弯抹角地暗示我不要管那么多“闲事”，我与他们展开了辩论，弄得不欢而散。在和我一道进行上述各种活动的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中的一个学生宋文煥（又名宋军）。他是高鹤县雅瑶区昆东乡人，请愿时他是学生代表推选的副领队，抗日宣传队成

立，他是秘书，县长请吃饭，他也在被请之列。他是个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的青年，尤擅长音乐和美术，他工作热情而有干劲、冲劲，有魄力。我和他一道研究抗日宣传队的工作，设法向南国剧社唐槐秋等作家索取宣传资料，排练节目，还自己动手编写歌曲和戏剧（记得其中有一个自编的短剧《钱串》，颇得观众好评），合作得很好。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在罗定当局对我的疑忌越来越深的时候，我听从亲友劝告，为防不测，晚上不再在罗中住宿，回到老屋过夜，也是紧闭门窗、行动谨慎。宋军住在附近——西门口陈卓玖家，他和我约定，以拍三下门为暗号，我才开门让他进来，交换和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有时他深夜才回家，不再进来，也在我的窗门上拍三下，表示无事，可放心休息，主动地负起了保护我的责任。后来他到桂林、福建升学深造去了。最近我收到他的来信和一张邀请我参加“宋军音乐创作四十七周年作品暨藏书画展览”的请帖，才知道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音协理事。他擅写儿童歌剧、歌曲，除在小学、幼儿园的音乐课本上登载的之外，已出版了儿童歌曲集七本，是国内知名的儿童歌曲作家。

教书，宣传抗日救国，生活是紧张而又有意义的，因为我尽自己的力量，做了一个中国人本份应做的事。但是，在当时的罗定当局和一些当地士绅的眼中，却认为是非份的坏事，于是，我受到各方面的劝告、暗示、恐吓，听说还被视为“异党”分子，我知道之后，又气愤又可笑，大发牢骚：

“总之，爱国有罪！抗日有罪！”于是更招致了他们的不满。终于，在一九三八年秋，我被罗中校长苏天元解聘了。

我想：留在罗定还有何作为？好，到抗日的战场上去！于是我和谭焯基决定投笔从戎。我们胸前佩带着罗中师生送的大红花，在他们欢送的队列前走向车站，离乡北上。我们是打算奔赴延安的，但是到了南昌，一打听，沿途敌伪封锁严密，无法通过。在南昌，我们遇到了中山大学同届毕业的陈炳翰（民主人士，致公党成员，当时在军队里做军法官），他也多方设法给我们联系，但也不成功。怎样办？留下再等机会？成功的可能渺茫得很，加之钱快用完了，没有后援经济，只得折回广州，再返罗定。

在罗定闲住了一小段时间，林一元回到了罗定。他那时在区寿年那儿帮忙，没有什么官职，只是为抗日做些类似秘书的工作。他邀我也去那儿。在广州沦陷前几天，我们与黄桂桑一行三人，取道广州、武汉到安徽前线去。当时区寿年是四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六师师长，其后因工作需要，成立师政治部，林一元任师政治部上校主任，黄桂桑任少校军法官，我任师政治部少校总务科长，但主要做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一七六师组织了一个豫、鄂、皖边区的政治总队，这个总队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一七六师政治部入部队编制的政工人员。二、自上海经武汉来的上海战地服务团成员，约二十人。三、广西学生军的政工人员十多人。四、在地方选招的青年学生十多人（当地不少青年学生热烈要求参加宣传队工作，只得用选择招收的办法解决。记得有个很年轻的姑娘听到消息，从她家乡穿过三个县，步行了几天，到来要求参加，也被录取了）。政治总队的领导成员是：总队长林一元；秘书余仲武（共产党员，解放初期曾任浙江省教育厅

长)。第一大队队长刘保罗（上海战地服务团队长）；第二大队队长丘唯峨（广西苍梧人）；另一个宣传队队长吕雄才，副队长黄非丹（原属上海战地服务团）。招选来的青年学生则分编进三个队里。

我们围绕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中心开展宣传工作，曾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华日报》社论等好些小册子，发下去作为宣传、学习资料。记得我初到湖北英山县时，有个上海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易杰和来自广西学生军的战士秦骏（广西苍梧人）共同负责编辑出版一份《大众报》，石印；另一青年胡剑锋则是负责抄写制版的（后来被反动派杀害）。他们为了工作方便，都住在英山天主堂里。我来时路经未沦陷的广州、武汉，曾买到几本《新华日报》社论单行本，后来又从秦骏那儿借阅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以此为参考，用“吕品”的笔名给报纸写文章，秦骏则多是写区寿年、林一元等视察各地的报道文章。后来国共磨擦开始，《论持久战》、《西行漫记》等都成为禁书，我便把它们秘密地收藏在当地一个老乡的家里。

师部设在潜山，我们经常下乡宣传。一九三九年夏，我师袭击安庆，区寿年师长、邱青英旅长和政治部主任林一元等在前线附近拉起一个帐篷作为临时指挥部，宣传队也随同前往。我们天天分析、了解前线的情报，接到通知即到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担架队，救护伤兵，他们都很积极很乐意地接受任务。战役结束后，清点缴获敌军的物资，其中有一台日本制造的精致玲珑的约信封大小的匣式收音机，师部把它作为奖品授给我，它可以收听香港电台，有利于宣传工作。

宣传队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队员把宣传工作做得很出色，演出的节目丰富多彩，还自编节目。在工作人员中，刘保罗的工作尤其出色，他文才敏捷，演技甚佳。记得有一次区寿年巡视各地，林一元和他随行，他即日编写了一个短剧，即晚排练演出，得到军民观众的喝采。还有过这样一件趣事：有一晚宣传队演出一个短剧时，剧情生动，扮演反动人物的那个演员表情逼真，令人切齿。忽然一个观众跳到台上，冲他一拳打去，全场观众愕然之下，随即哈哈大笑。上海战地服务团中有不少人是共产党员，但爱国抗日的共同目标和思想感情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关系融洽，合作得很好。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紧张而又非常富于情趣的：每天拂晓，人们就起床活动开了，第一项课程是唱歌，雄壮的歌声在大地上飞扬，在群山间缭绕，我本来是个“歌盲”，在这气氛的感染下也学着唱起歌来了。

一七六师隶属于第五战区的二十一集团军第四十八军，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副长官李品仙。一七六师有个补充团，团长云应霖，副团长李伟烈。李曾邀我到他的团任指导员。其后区寿年又提升为有职无权的四十八军军长，林一元任军政治部上校主任，我任中校科长。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病死后，李品仙兼任其职，在古碑埔（又名金家寨，后曾改名立煌县）办了一个干部训练班，抽调各区乡干部和部队政工人员受训，目的是将来搞保甲制度，他调我去干部训练班任第十三队的指导员。在训练班临结业时，他叫我去，问：“训练班学员中有没有共产党员？有多少？”我回答说：“没有。”他厉声说：“你敢担保？”我说：“我所知

确无共产党员。”那时国共已发生磨擦，有风声说重庆方面要将新四军调离驻地，有些人想离开这儿，我曾让他们秘密地隐蔽在我处。记得其中有一人（姓名记不起了）患了严重的牙炎，疼得厉害，脸都肿了，但在当时的处境是无法找医生诊治的，我姑且试用黑人牙膏挤敷患处，竟出现了奇迹：治好了。不久，区寿年把上海战地服务团的人送到六安，让他们回新四军去。后来听说刘保罗在一次宣传演出中，由于另一演员的手枪忘记退出子弹，竟被失手打死，消息传来，我觉得这位有才华的青年死得可惜，难过了许久。

皖南事变前夕，国共磨擦加剧发展，形势越来越险恶，李品仙的部队竟悍然围攻一七六师补充团，俘虏了云应霖、李伟烈（李于一九四〇年被害）。区寿年为此专程去见李宗仁，路经古碑铺时，我去见他，他说：“我去保云、李二人，可能不回来了。”我问他：“那我们怎么办？”他沉默片刻，说：“可能也站不稳了。”果然，不久，区愤而辞职入陆军大学深造，林一元去安徽太湖县当县长，我和黄桂桑也被迫离职。我们到太湖住了两个多月，由林一元联系安排停当，就动程回乡了。

我们从太湖首途，取道宿松、黄梅、望江县，到了长江边有个人们叫它“不为三斗米折腰”的地方（彭泽县属），这个地方又有“三通”之称：通南京，通沦陷区，通重庆。要到什么地方去，都有船家愿意受雇通行，唯一的危险是碰到日军巡逻江面的橡皮艇就不通了，到时船家搭客，各安天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西俗的圣诞节，又是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当头，我和黄桂桑雇好船家和既挑行李又当

向导的挑夫，在江边等了好久，船家才叫我们上船。时已深秋，江风刺骨，我们走出船头，仰视月光明朗，但我心头阴霾暗积。想到陶渊明不为三斗米折腰的风骨，想到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豪迈语言，感慨莫名。到了半夜，听到江面远处有橡皮艇的马达声，船家示意我们蹲下，手里加速运桨，抵达江边，船家嘱咐我们上岸，隐蔽在江边的芦苇丛中。天亮起程，走不多远，就到了自己防地，然后取道衢州，乘火车经金华、江西等地，由南昌过梅岭，回到韶关，再经清远、四会、广利……，历尽艰险，备尝苦辛，回到了罗定。

回到罗定，失业，一度经商。一九四一年在罗镜泮水中学教书。一九四三年二月到罗定师范教书兼事务主任。在此期间，我仍是“好管闲事”的不安份的家伙。我对罗定国民党县党部的人甚至炙手可热的三青团头子叶剑锋要在罗定师范发展三青团组织的事，表面应付，实际不予理睬。我听到叶剑锋漫骂“罗师最坏”，又带部分师生涌到三青团总部提出质问。一九四三届罗师简师毕业班编印同学录，我和谭明昭、谭煊基、黎兢都给写了文章。我的文章大意是：同学们毕业后回到农村，要与摧残儿童身心的封建教育的私塾或变相的私塾作斗争，要做良医，使自己成为刮骨疗毒的华陀。于是，我和罗师的大部分教师都被列入了黑名单。

一九四四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室主任的李济深来罗定视察，罗定各界人士在旧罗师中山纪念亭前的大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会场上挤满了人，其中多数是罗城镇各中学师生。李在大会上作了演讲，主要内容是：枪口

一致对日，坚决抗战到底。到会的人越来越多，会场上挤不下，人们就自找位置，我记得当时罗师校舍思齐楼上的走廊和门窗边都是人。在演讲过程中，口号声、掌声不断，气氛非常热烈。当时蔡廷锴住在谭启秀的房子榴园里，谭明昭常去那儿，李济深的秘书余勉群（解放后为民革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随行，我才知道了李济深罗定此行的因由。

当时，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反感很大，尤其对他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更感愤懑，各界进步人士纷纷秘密酝酿筹组各种党派、团体，希望以此促使蒋介石放弃他的反动政策，实现抗日民主政治。李济深曾邀约国民党内知名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蔡廷锴等秘密筹组一个真正执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民主政治的组织，后来因为桂林迅速沦陷，李济深和何香凝等都被迫疏散而搁浅。不久李回广西原籍苍梧县后，借视察各地的机会，来到罗定与蔡廷锴等在榴园磋商成立组织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李济深从罗定返回苍梧后，即着胡希明、余勉群草拟组织章程。适值那时何香凝也从广西八步寄来一份章程草案再派余勉群带来罗定请蔡廷锴过目，作最后研究修正签名。

一九四五年夏天，罗定教育局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黄达材和三青团头子叶剑锋的指令下，通知谭明昭校长转知我离开学校，于是我又一次地被无理解雇了。

抗战胜利，广州光复，我即到广州经商谋生。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意图愈来愈明显，举国哗然。蔡廷锴与李济深、李章达等

商量研究，于三月在广州筹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组织（简称“民促”）。推选蔡廷锴为主席，选出余勉群、谭冬菁、林一元、谭启秀、叶少泉等十多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并派谭明昭为秘书长。会议决定筹款在广州办一份日报，作为“民盟”、“民促”两会的机关报，当时余勉群曾来找我商量关于购买印刷机器和把港澳华侨支援的外币、黄金进行兑换等事。后来已租定了惠福东路六十六号为报社地点，机器也即将安装完毕时，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侦知，广州行营下令封闭报社，并警告蔡、李二人限日出境，蔡廷锴不得不将民促中央理事会迁往香港，为了加强民促的工作，指定由谭明昭以中央理事会秘书长的职务负责处理民促的日常事务。此外，还在广州秘密成立了民促广东分部理事会，谭启秀为主任理事，余勉群为秘书组主任，林一元为组织组主任，叶少泉为财务组主任，梁甲荣也被选为理事。

是年年底，蒋帮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不少民主人士纷纷奔赴香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的领导人谭平山抵港后，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商量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的民主份子和反蒋派系的联合组织，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我是在一九四七年初参加“民促”组织的，因为我觉得“民促”的宗旨符合自己的愿望。我一向认为真正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可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中国的，而参加爱国运动的十多年的亲历和见闻，又使我认识到蒋介石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不得民心，发动内战，更遭民怨，非与之斗争不可；于是我下决心，投身于爱国民主运

动。我与同志们开秘密会议研究斗争策略，平时经常和我联系的则是余勉群，林一元等人，这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本来已有警觉，搬到万福桥一条偏僻的小巷里一间小楼房的二楼居住，但也被他们觉察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卅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军警纷纷出动拦截，他们用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喷射，鸣枪示威，还殴打、逮捕了一些人。深夜，两个宪兵到我住所敲开了门，说是检查户口，一进门就动手翻阅我的书籍、信件等物，随后叫我和弟弟吕雄飞跟他们去。我们先被带到广州公安局贤思分局，过了一会儿，近天亮时，又被押上警车，被带到中央银行的一所大房子里。进去后开始搜身，我们的手表、金戒指等物被拿走了（后来也没有发还），然后被带到一个大房里。看来这是一个临时囚禁所（后来听说是银行的仓库），虽有军警守门而无监狱设备，人们可以随意成群地围坐在地板上小声交谈。记得在这儿我遇到了原来不相识的李子诵，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不是做生意的么？为什么也入到这里来了？”我含糊地回答：“是啊，莫名其妙！”出狱之后，我才知道他也是“民促”成员。从囚房的窗子可以看到外面的马路，只见一部部警车陆续呼啸而来，吐出一群群的“犯人”。这样一连几天，被捕的人越来越多，房子里越来越挤。“犯人”的食物每天由家人送来，但不许见面。我们分别受到传讯，我在押约十天期间，被传讯了两三次。他们总是盯住几个问题不放：日间群众游行时你有没有参加？当时你在哪里？晚间有人在永汉分局聚众闹事，你有没有参加？当时你在哪里？并

进行恫吓逼供：老实点，否则……；你们这些“异党分子”，就是狡猾，不老实承认，有你好看！……等等。这事由我的家人转知了在香港的蔡廷锴，他大发雷霆，知会区寿年设法营救。那天区寿年和彭程（又名彭瑞光）到来保释我的时候，也只是远远地和他们见了一面。

一九四八年一月，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以原“民促”、“民联”两组织成员为基本成员，选出了民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但“民促”、“民联”仍保留组织名称，所做的工作与民革的工作完全相同。

同年四月，民革中央决定成立民革广东分会，并指定谭启秀为广东分会主任委员，至此，民促广东省分部的工作完全归到民革广东分会去了；另外还成立民促广州市分部，黄华润为主任理事，我也被选为理事。其后，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残暴行为日益加剧，民革、民促的“三反”的正义斗争也蓬勃开展，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又开始了大搜捕。其时因谭明昭、谭朗昭兄弟往返罗定广州时会到我处住宿，于是我又搬到六和新街区寿年住宅楼下居住。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了余勉群、叶少泉等同志，加以严刑拷打。林一元到我家住宿，国民党宪警又到我家“查户口”来了。我开门出去，他们就问我：“林一元是否在这里？”我镇定地回答：“他没来过我处啊！”他们不相信，我说：“家里只有我母亲、妻、儿和一个保姆，我敢以全家的生命来担保，不信，请你们进来看清楚。”说完，随即一边敞开大门请他们进去，一边用

漫不在意的口吻说：“区寿年在二楼，可能林一元在他那儿吧。”他们面面相觑，怏怏地走了。翌日清晨，我让林一元换过装束，头戴毡帽，身穿唐装衫，活象个小商人模样，看清楚门前左右和附近一带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就和他共坐一辆双座三轮车，直往西关，找了一个妥当的地方，安置他在那儿隐蔽了几天，才出走香港。

在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下，广东民革、民促的组织活动不得不更隐蔽。有的人离开了广州，我个人也搬到仁济路一间与人合股经营火柴原料生意的商店同信行里居住。为了避免引人注目，余勉群到我处来联系工作的时候，常常变换穿着，林一元也多次到我处住宿。

解放战争迅速发展，风声更紧，广州多次开始大搜捕，工作无法开展，心中十分苦恼。记得在1947年某天，刘兆祺来通知我，区映寰乘搭他从罗定装运鸡鸭的货船到了广州。船停泊在白鹅潭，我乘搭一只小艇去和他会晤，我们谈论了时局形势和反蒋救国运动的方向、策略。后来，谭明昭又知会我，“将来会派人回罗定打游击，你可回罗定活动。”于是着手筹备回乡。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举家返回罗定，一边经商谋生，一边从事政治活动。主要是联络一些亲朋戚友和地方上的开明人士，从精神、财力、物力各方面支援在罗镜打游击的十四团。我在开设的雄信商店门前摆了一个杂货摊，其中有游击队最需要的雨衣、冷衫和一些日用品都是由潘宗英挑选出来带回罗镜去的。

罗定解放后，我重返教育界服务。一九五三年，党和政